

思想与  
世界

张文敬译

〔法〕艾曼纽·卢瓦耶 著

Paris à New York  
Intellectuels et artistes  
français en exil 1940-1947

# 流亡的巴黎

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流亡的巴黎

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

张文敬译

〔法〕艾曼纽·卢瓦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ARIS À NEW YORK: Intellectuels et Artistes Français en Exil (1940—1947)  
by Emmanuelle Loyer© Grasset & Fasquelle,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8—0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法)卢瓦耶著;  
张文敬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思想与世界)

ISBN 978—7—5633—8400—6

I. 流… II. ①卢…②张… III. 知识分子—研究—法国—  
1940~1947 IV.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29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燕郊镇圣屯)

开本:965mm×690mm 1/16

印张:23.5 字数:280千字 插页:8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水的故事

在《忧郁的热带》一书的开篇中，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sup>①</sup>狂吼：“我痛恨旅行与探险家。”虽然他在意念中用嘲讽的口吻坚拒一切的旅行冒险，但他也会追忆起 1935—1938 年间远渡大西洋前往巴西期间对故乡的思念。当时海运公司的大型邮轮把大学教授、外交官、军人或外国商人送到南美洲，而他们之中某些人并不止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他们在轮船上度过平静的十九天，与天空和海洋长时间无休止地对话，在“几乎无止境的空间”中沉醉。轮船上的宁静、佳肴美馔、少数人享受的豪奢、吸烟室的安逸舒适、靠岸时闻到的芳香、看到的色调变化，这一切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记忆中，成为一场感官的盛宴和梦想的源头。将两段人生间隔开来的这次旅行成为他生活习惯改变之前的“减压舱”，而列维-斯特劳斯把这段空虚而幸福的日子与“消逝的文明”直接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由于战争爆发，他又经历了另一次过程相似而方向相反的海上远航，这次远航在过往的记忆与现实的写作(1954)之间画下裂痕：“(1954)这次出行计划匆促取消了，而在继 1935 年那次旅行之后，1941 年，我又出海远航过一次，那次旅行的经历在未来的时代将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我当时并未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斯特劳斯被迫离开法国，在纽约谋得教职。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他于 1941 年 3 月在马赛再次登上海运公司的轮船，与几年之前如出一辙。然而“保罗-勒梅赫勒船长

---

<sup>①</sup>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巴黎读完中学与大学，并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1955 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

号”早已物是人非：三百五十人挤成一堆，像“递解囚犯”一样在头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包围监视下登船。这次鸡飞狗跳的出海远航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最后一次，它预示着战争和大逃亡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它也象征着人口过剩的当今时代。1941年的这次远航对他来说是一段人生的开始，世界开始对他充满敌意，而逝去的时光再也无法重现，因此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充斥着一种浅吟低唱的乡愁。

《忧郁的热带》一书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其象征意义，首先是1941年那次漫长的越洋旅行前的登记。虽然流亡并非自愿，但流亡者也算是一种旅客。黑暗年代<sup>①</sup>的大逃亡与现实和幻想中大规模横渡大西洋的经济背景融为一体：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自东向西穿越大西洋来到美洲，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自东欧和南欧。在1880年到1914年间，每年约有一百万人来到美国。南希·格林<sup>②</sup>在最近的一部作品中强调，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水的故事”：在移民的梦想中充斥着船只、港口和暴风雨，“波涛”、“洋流”、“人潮”等词语在迁移的描写中维持着一个流体语义场。横渡大西洋之旅的另一面，是科学探险的不朽功业，殖民探险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突飞猛进，西方人种学家也对欧洲以外的土地不断探索，走得越来越远。斯特劳斯后来在巴西边境寻找到的原始文明与之前在邮轮上的极度奢华形成对比，而这种奢华乃是国家科技的光荣，同时也象征了一种休闲的文化。

1941年的这次航行同样发生在这种“水的故事”，也就是横渡大西洋的背景下。列维-斯特劳斯乘坐同一家公司的轮船，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船上简陋的条件、难以预料的前途造成的恐惧和焦虑，这一切使这次航行更像是穷苦人为寻找更美好的生活而远渡重洋来到爱利斯

---

① 黑暗年代指20世纪40年代。

② 南希·格林(Nancy L. Green)，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历史教授。

岛<sup>①</sup>。但“保罗—勒梅赫勒船长号”上的乘客包括知识分子、工人领袖、外国人，他们都被马赛保安队称为“贱民”，出于不同的动机前往美洲。与此同时，这次航行被看成对人种学探险的恶搞：这一次这些未来的流亡者，“集中营的猎物”，成为走在灭亡道路上的部落族群。上一次旅行的安逸、宽裕、豪奢是为了探索另一个国度，而这一次旅行的简陋、拥塞、穷困却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祖国。从前是船上的贵宾，现在则是走投无路的难民。斯特劳斯曾被他的朋友帕特里克·沃尔伯格<sup>②</sup>形容为“西班牙贵族”，如今却流落在甲板上，他享有的唯一特权，就是入住船上的两间蒸汽舱之一，而这一微不足道的特权对他来说却已经是极大的好处了。安德烈·布勒东<sup>③</sup>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他“穿着毛绒外套，看起来像一只蓝色毛毛熊”。

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在“保罗—勒梅赫勒船长号”上这三个月的曲折行程，在二次大战的背景下正如外出探险、建功立业的反面。因此，这艘因搭载名人显要而著称的轮船——船上乘客中还有维克多·塞尔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伙伴，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战争年代大规模逃亡的象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欧洲人摩肩接踵离开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的象征。虽然本书提及的1940—1941年法国逃亡人数有限，但德国逃往北美和南美洲的人口达到近二十二万，而西班牙因反对佛朗哥统治而逃往墨西哥的人数也达到二万左右。

### 被忘却的插曲

1940年，在法国军队溃败，第三共和国土崩瓦解，法兰西国家<sup>④</sup>

- 
- ① 爱利斯岛(Ellis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附近，曾经是移民检查站，大概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美国人的祖先都曾经在这个27.5公顷大的小岛上居住过。
- ② 帕特里克·沃尔伯格(Patrick Waldberg, 1913—1985)，超现实主义作家，诗人。
- ③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超现实主义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
- ④ 法兰西国家(l'Etat français)，又称维希法国，是二战期间维希伪政府的国号，有别于“法兰西共和国”。

建立后，一些法国人以及旅居法国的外国侨民或是受到维希政府的纠缠，或是感到自己很快将会不受欢迎，决定逃往国外。这一决定往往只是权宜之计。对于某些犹豫不决的人来说，逃亡是面对越来越紧的风声而产生焦虑感时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法国于1940年10月制定第一部《犹太身份法》(Statut des Juifs)，而驱逐犹太人的风潮从7月便已开始。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正如大卫·鲁塞<sup>①</sup>后来所说的黑色幽默一样，法国，甚至欧洲不久之后只剩下两个出口：马赛和奥斯维辛。这些犹太人中的三四千人通过不同途径最终逃亡到了美国。

尽管时局危急，美国联邦政府并未放宽20年代制定的移民审查法。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状况和大量失业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胡佛从1930年起将移民限额缩减到此前的百分之十。不仅限额本身缩减，这一决定导致赴美签证也极难办理。在政府受到其中立地位的束缚时，许多美国协会组织担起这一重任，力邀遭到法国政府一次或多次驱逐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前往美国。依靠大西洋彼岸的援助，许多感到威胁、愿意前往美国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出版家、记者、大学教授和工人领袖得以实现愿望。而被美国接纳的逃亡者显然是经过“挑选”的，受到青睐的是年纪较大的男性，具有一定的声望，大体上站在社会民主阵营，并且大多数之前曾经与美国有过联系。

就这样，在整个战争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流亡知识分子会聚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奇怪的是，虽然有关知识界精英的历史文献现已相当完备，但这段历史却不为人所知：法国历史文献的焦点集中在当时对德国占领者的抵抗和投降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为占领者所同化的程度上，对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却只字未提。戴高乐在1943年10月30日的演讲中号召法国知识分子抵抗阵线的领袖团结在一起，当

---

<sup>①</sup> 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 1912—1997)，法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创建了国际工人党(POI)。

时阿拉贡<sup>①</sup>留在法国而马利丹<sup>②</sup>在美国,贝尔纳诺斯<sup>③</sup>也在巴西。然而这些流亡知识分子从未被当作抵抗运动成员。只要流亡者不是前往伦敦,流亡行为与抵抗运动几乎是互不相容的。

虽然《法国研究》(*French Studies*)近年来所刊登的文学研究显示出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的苗头,但美洲大陆从总体上看仍然偏重德语国家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贡献。在对法国赴美移民的研究领域,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些短期流亡者进行深入探讨。法国流亡者并未在美国留下后裔,而且与当时在美的主流法侨团体也很少联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手上的史料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政治历史方面:有关“自由法国”得到承认与否的问题,或者法侨在罗斯福与戴高乐合作中的角色问题,而这些史料往往却出自这些流亡者的笔下。

这段历史的缺失或许可以用人数太少来解释,但另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更为重要。自30年代起美国对新移民共有三种一体化模式:融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anglo-conformity);在多人种国家的熔炉(melting-pot)中成为新美国人;抛弃祖国文化,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cultural pluralism)中。战后,大约从1944年到1947年,流亡者大规模返回法国。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体化机制的一次失败。而这一失败却与德国流亡者形成对比,后者之中的大多数最终定居美国。鉴于这一点,法国流亡者带给美国的贡献与“流亡魏玛”<sup>④</sup>在十余年中向美国输出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主张相比要少得多。德国与奥地利知识分子与祖国决裂后能够在意识中完成自我重建,同时重建他们的知识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文化也得到极大的丰富,而法国流亡知识分子既未表现出,事实上也未曾经历这种与祖国的彻底决裂。

---

①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

② 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法国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③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

④ 魏玛(Weimar),德国城市名,1919年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制定了第一部共和宪法,人们把这个宪法称为魏玛宪法,依宪成立的共和国为魏玛共和国。



从法国方面看,虽然流亡知识分子在流亡期间仍从事学术工作,并在法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时起到了喉舌的作用,但战争期间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对艰苦时期出逃的这些流亡者仍然抱持一种道德谴责的态度,带着不信任的眼光迎接他们回国。从战后直到70年代,法国知识界长期被象征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所统治,对曾经住在“山姆大叔家”的避难者倍加歧视,因此这些流亡知识分子也一直被人遗忘。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多人眼中,美国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圣地,而是反动典型。尽管某些人对美国心怀感激——例如斯特劳斯强调旅美之行对他的思想贡献——但对这段历史的否认成为一种潜规则。最夸张的当属布勒东。在《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一书中,他把在美国度过的五年浓缩成一小段,并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在那里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毫无地位,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些。”意识形态时代和氛围已成历史,然而对逃亡者的负面评价依然存在,热罗姆·加尔辛在一本赞美抵抗运动成员作家让·普雷沃的书中隐晦地提到:“占领年代的法国文学家即使没有投敌,大多也是闭门观望,或者流亡到大西洋彼岸。又有几个人奋起斗争呢?”在让·马拉盖<sup>①</sup>的《战争日记》及续集《侨居日记》再版序言中,让-保罗·希克<sup>②</sup>把流亡生涯描绘成马拉盖经历过的炼狱,证明了人们对流亡者的负面印象。他写道:“即使是回到法国的流亡者也无法摆脱逃兵的宿命:就算不敢说他们一无是处,但他们的言论总被当成耳旁风,仿佛他们的假洋鬼子身份从一开始就让他们置身事外,至少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发言权,而当时留在法国的人才有权高谈阔论。”从二战结束一直到现在,这些流亡者,尤其是当他们含羞回到法国后,他们的言行总是与失操败德画上等号。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又把这段在战火硝烟中被边缘化的插曲旧事重提呢?并非是为这些在卷帙浩繁的二战文献中缺席的博学鸿

---

① 让·马拉盖(Vladimir Malacki, 1908—1998),原籍波兰的犹太裔小说家、散文作家。

② 让-保罗·希克(Jean-Paul Sicre),腓比斯(Phoebus)出版社创始人。

儒申冤,也不是盼望考据出奇迹,找到历史之链上脱落的链环,解开那些年深岁久的谜团。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再专注于盲目的勘校考据,一些苛求“事件真实性”的假命题已被淘汰,除了参战各国的政治军事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受到关注。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抵抗运动而构筑的那些壮丽故事,另一方面是确保法国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那些文人墨客在我国国民心目中的偶像身份,在这两者面前,对流亡历史的评议论证不失为另辟蹊径的一项研究:把一段在时间上平行、空间上交错的历史作为法国二战史的比照。流亡行为经常被认为是误入歧途。长期以来的法国和西德,在流亡与背叛之间画上等号,流亡者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与主流记忆之外。或许现在是让他们回归的时候了。

### 流亡,民族与抵抗运动

从多方面看,移民与流亡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这几十年来难民数量暴增,在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引起不休争论。流亡者的形象在现代意识中意味深长,它对历史学家纠缠不休,迫使他们“戴着有色眼镜重读 20 世纪史”。历史学家现已着手建立跨国历史学的尝试,因而他们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国家层次,凝聚在这些流亡者身上。民族意识的制造流程——编造历史、神话、文化遗产、制定语言政策……在各国或多或少都一样。“创造民族”的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各国知识界精英中已经普及。安娜-玛丽·提耶斯<sup>①</sup>在提到 21 世纪初欧洲开始启动的民族意识形态“实验大工厂”时这样写道:“再没有什么比国民身份的形成更加具有国际性的了。”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流亡者,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参与到了这个“实验大工厂”之中。他们被祖国驱逐甚至剥夺国籍,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国民身份这一问题。

---

<sup>①</sup> 安娜-玛丽·提耶斯(Anne-Marie Thiesse),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逃亡浪潮是欧洲大规模移民运动的一个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界精英离开了受到独裁和战争威胁而奄奄一息的欧洲,来到美洲大陆。以流亡为主线重新审视战前和战争期间那些动荡年代的历史,就是把这些历史舞台上不幸的演员重新纳入我们的视线,他们之中有移民、难民、流亡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在社会、职业、文化甚至法律上受到歧视。直到1951年,日内瓦公约承认个人而非集体的难民身份,允许外国对个人流亡者予以保护,流亡者才算是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流亡者的人生轨迹具有地域上和文化上的复杂性,这促使我们“对几股不同的力量不断探索,而这几股力量把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文化历史研究角度彻底推翻”: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种情况下,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力在美国交汇,文人模式(幕僚、专家、预言家、思想家或者自由艺术家)进行迁移,意识形态被传递、输送、效仿,文化共鸣的效果使得一部在民族背景下创作的作品能够为其他民族所接受。

最后,对流亡的研究促使我们换种方式对战争年代进行思考。在法国,只有对维希伪政权的拒绝行为才能被划入“抵抗运动”一类,而这个“抵抗运动”概念本身往往还存在疑点。对瓦里安·弗莱伊的救援行动以及1940—1941年间马赛救援通道的深入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先于抵抗运动的抵抗”。这条救援通道的终点是亡命天涯,而如果亡命天涯等于背叛,救援行动就不能归入政治军事上的抵抗运动。因此,“先于抵抗运动的抵抗”这一主张在二十年前还被视为异端。

此外,马赛被视为流亡的必经之途,也正是在这里,南区<sup>①</sup>的抵抗运动开始得到统一组织。因为马赛当时已成为整个欧洲流亡者的避难所,而且左派思想在该地区也已根深叶茂,马赛似乎可以排在里昂之前,被冠以“第一代抵抗运动首都”的称号。我们还可以把弗莱伊创办的紧急救援委员会(ERC, 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这类组

---

<sup>①</sup> 法国向德国投降后被分割为南北两区,北区由德国军队占领,南区由维希政府控制。

织也纳入这一“抵抗运动萌芽”的概念。该组织后来与一神教服务委员会(USC, Unitarian Service Committee)、基督教青年协会(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CEM)等严守教规的类似组织渐行渐远。该组织留在法国的成员——达尼埃尔·贝内迪特、让·热马林、保罗·施密赫——之前曾经拒绝,但后来还是完全投身于抵抗运动。很明显,人道主义抵抗运动与军事抵抗运动之间的关系如同紧绷的丝线,随时可能断裂。

把流亡史纳入法国抵抗运动史,就是承认这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在历史文献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抵抗行为也属于法国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对战争研究的一个新观念现在也得到了充实。在二战研究中,对战争造成的“迁移、驱逐和伤亡应该予以和战争中的军事冲突同样程度的重视”。在对流亡行为展开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力求更加充分地理解流亡者遭受的各种形式的排挤拒绝——隐藏在政治、军事抵抗运动身后的世俗和文化形式的拒绝。

### 流亡与迁移,从非思<sup>①</sup>到解锁

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史学革新的热潮,在这场热潮中对迁移和流亡的研究手段和角度发生了变化,让我们终于能够换种角度来审视历史和民族架构。费尔南·布罗代尔<sup>②</sup>于1986年出版《法兰西的特性》一书,描绘了由漫长历史构建的法兰西社会的格局,此后又有其他历史学家打破了布氏三分法(经济/社会/政治)的束缚,尝试着展现法兰西的另一面,一个“熔炉”,一幅“镶嵌画”,异族对法兰西的影响不再被抹杀。这种视角的或然甚至必然变化可能应归因于政治和社会环境。入境移民在这十年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话

① 非思(l'impensé),又译不思、不可思想者、不可思考者,海德格尔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指哲学家意图述说却未能借由文字说出,隐匿于其字里行间之物。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第二代大师,在法国和国际史学界享有盛名。

题——一方面是异族受到极右势力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是对法兰西民族“兼容并蓄”的赞美——这些移民意识形态被法兰西思想所统合,迫使历史学家认真对待入境移民,并把该问题整体纳入其研究体系之中。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人们逐渐意识到并论证出移居和移民在“法兰西建筑”中的地位,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反法西斯和反佛朗哥人士)的流亡在法国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抵抗运动时期)的角色,以及对法国对外政策,包括最不光彩的那段历史在内的正确认识,这一切都使得我们能够走出“沉默的记忆”,摆脱陈词旧套,最终拥有一种新的、更丰富充实的对法兰西特性的见解。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好像已经相当遥远,而法国人现在似乎也已经接受了一些这样的新观念,例如承认入境移民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法国社会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人的自我认知体系在一个特殊时期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自1945年以来一直支撑整个民族意识的理论思想都已日暮途穷。由于它们的衰落,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体系正在崛起。

此外,法国的离境移民现象一直遭到忽视和低估,而这种低估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离境移民与民族构建进程相抵触,在整个19世纪都象征着叛离。当时的离境移民主要来自尚未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边远地区(阿尔萨斯、巴斯克地区……),这些移民受到当局的歧视,被当成祖国的叛徒。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期曾追随这些负面的成论,然而后来却发现这些移民并不仅仅去往殖民地,往其他地方的迁移也成规模。虽然入境移民的存在已经众所周知,虽然最新的移民史观点甚至认为殖民迁移是宗主国历史在境外的一种延伸,但是那些侨民在背井离乡的同时也从本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可以作为证据的,例如19世纪那些去往北美的移民,虽然数量比去往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多,却被人遗忘。在现代历史上,这种遗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二战期间侨居美国的法国流亡者身上。

在二十年前,有关流亡的历史文献同样匮乏。《流亡铁丝网》(*Les Barbelés de l'exil*)是一部关于流亡法国的反纳粹者的先驱著作,其

作者吉尔伯特·巴蒂亚在1989年曾经写道：“关于希特勒，关于第三帝国的出版物现在和将来都数不胜数，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然而那些高瞻远瞩、始终不渝地与希特勒斗争的人，关于他们的著作却屈指可数。似乎过了四十年后，法国的舆论故意要忽略掉这些流亡者和他们的警世之言。”1991年，三场题为“流亡与迁移：在法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流亡者（1938—1946）”的国际研讨会分别在都灵、萨拉曼卡和巴黎召开。在研讨会上，众多历史学家被动员起来开垦这片处女地，而这一领域当时被各种陈词滥调和无稽之谈所湮塞——例如，有人称在“大撤退”中逃往法国的所有西班牙难民最后都被说服定居在法国，然而实际上在1939年2月到达法国的四十五万西班牙难民中，有三十五万人从1940年起就陆续回到西班牙；有人称，流亡者们因萦绕心头的记忆而对流亡事迹夸大其词：“当今出版的所有关于西班牙人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作品都是过去的流亡者所写下的。”直到几年后的最近时期，热纳维埃芙·德雷福斯—阿尔芒<sup>①</sup>在《从内战到佛朗哥死亡期间西班牙共和党人在法国的流亡》一书中依然强调，关于流亡的文献资料均出自流亡者本人笔下。这些著作共同的目标是走出战争的记忆或者是遗忘，并且致力于厘清法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如果我们想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之间）的这些联系是否在欧洲一体认知的产生中有所作为”。

大家都把这项史学上的新进展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两个现象在这项进展中尤为突出，这两个现象或许可以解释这种不自觉的遗忘，至少可以说明为什么法兰西民族总感到芒刺在背。第一个现象，外国人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参与总是被压缩到最低程度。众多研究认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戴高乐—共产主义思想对法国人如何编纂本国历史的影响，抵抗运动中左倾爱国情感的重新崛起，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抵抗侵略者的形象，是产生这种沉默的三个根源。

---

<sup>①</sup> 热纳维埃芙·德雷福斯—阿尔芒(Geneviève Dreyfus-Armand)，历史学家、法国现代国际文献资料图书馆馆长、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馆长。

第二个现象有关于法国对在独裁或极权政体统治下出逃的外国流亡者的接受态度。从1939年2月起就有西班牙流亡者在法国避难，二战爆发后其他国家流亡者也陆续来到法国，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集中营。瓦尔特·本雅明于1939年秋天被关押在维努施(纳韦尔附近)的“志愿劳动营”，而汉娜·阿伦特在1940年5月到7月则被关押在居尔的类似场所。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本雅明最终在集中营内自杀，这些场景相互交织，犹如附骨之蛆，更加使人不得安宁。长期以来，对西班牙自卫队士兵以及平民的不当对待一直以法国当局未能预料到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涌入因此缺乏准备为由来解释。但这一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这些集中营“被更加悲惨的集中营所掩盖”，引起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一方认为，垂暮的第三共和国对外国流亡者的关押以及维希政权对他们的驱逐政策显示了一种政策上的继承而不是转变；而另一方则坚持，维希在对待外国流亡者问题上与前任政府有明显的分歧，贝当政权根据停战协议第十九条会毫不犹豫地要把政治避难者交给德国人。从第三共和国到维希政权，虽然关押的判决是相同的，但其中包含的意义却不一样：第三共和国是隔离，而维希则是驱逐。

法国自命为庇护之地，毫无疑问，流亡者在法国集中营的遭遇把这个国家的矛盾性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就像拉尔夫·斯科尔所写的那样，虽然法国没有违反庇护权的原则，然而却是“违心地”去履行庇护义务。

### 流亡：一种“双重缺席”

流亡绝不是与家乡干脆地一刀两断。流亡者经受着无穷无尽的“坦塔罗斯之苦”<sup>①</sup>，他们远离自己的亲人，却总能道听途说到他们的消息。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滋长了他们的乡愁，也加深了他们

---

<sup>①</sup> 坦塔罗斯之苦，坦塔罗斯为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了，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象征可望而不可即所致的难熬的痛苦。

对故乡的渴望。流亡者在离境移民的梦想和入境移民的苦痛之间徘徊,因此,阿卜代尔马莱克·萨亚德<sup>①</sup>把流亡的意义解读为一种“双重缺席”:对于驱逐他们和容纳他们的两个社会的缺席。

虽然离乡背井,但是这些流亡者仍然希望继续坚持政治活动,并且努力为海外政治运动的组织奠定理论基础。某些政治学家把流亡定义为政治领域的离境移民,或者国内政治在国外的延伸。斯蒂芬·杜伏瓦<sup>②</sup>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流亡者把解释自己出逃的理由看得多么重要,以宣称自己拥有国家权力的正统地位,并且是被奴役人民的真正代表。历次流亡的导火线分别是:德国的国会纵火案、法国1940年向德国投降,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事变”。流亡者在7月14日法国国庆也举行内部纪念活动,而这样的纪念活动既是在祖国和同胞面前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也是为了在众多国家的流亡者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为获得国际认同的斗争便成为辨别流亡者构成中几个不同极端的唯一依据。这一构成尤其适用于二战期间旅美的法国流亡者。他们分裂成几个并不稳定的集团,相互竞争,竞相努力得到与美国政府对话的许可。众所周知,自由法国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才使得美国承认其合法地位,确保了自由法国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法国在美的戴高乐主义集团不停地努力希望得到官方承认,却没能在1944年10月的最终决议<sup>③</sup>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流亡者在文化界起到媒介作用,它们自愿在社会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扮演中介的角色,而这种交流也能够以其他的方式进行:例如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和共产国际的数次会议。流亡知识分子投身于一些文化工作——翻译、教学、出版、新闻、电台主持——而这些文化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工作。这类关于文化传播课题的研究由

① 阿卜代尔马莱克·萨亚德(Abdelmalek Sayad, 1933—1998),阿尔及利亚裔法籍社会学家,被誉为“阿尔及利亚的苏格拉底”。

② 斯蒂芬·杜伏瓦(Stéphane Dufoix),历史社会学家,巴黎十大副教授。

③ 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戴高乐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



米歇尔·埃斯巴涅<sup>①</sup>和迈克尔·沃纳整理成理论。他们的研究显示出法国文化精英与德国语言文化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发挥作用的媒介(其中包括流亡者,也包括大学教师之间的交流等其他因素)以及产生的后果。一般来说,流亡者“与流亡组织保持的距离越远,他的媒介能力就越强”,而这种媒介能力也与接纳国的文学容纳度、流亡者本人的社会形象与文学地位以及流亡者祖国在世界文坛的影响等多重因素有关。

根据这一观点,也可以把流亡当作一个社会实践的实验室,“如果流亡者什么都没得到,并且与他脱离和进入的两个社会不停地讨价还价”。为了重新获得他们的地位,尤其是知识精英地位,流亡者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策略: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属于流亡社会群体,捕捉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在回到祖国后则表现出与流亡时期截然不同的面貌。事实上,即使他们回到祖国,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流亡者的醒目形象示人,这些回到祖国的知识分子则参考他们的经验,以自己的语言技能和历史学识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或者注解自己的炼狱生涯。

### 博弈矩阵图

从文化媒介或政治干预的角度思考,可以推论出一种聚焦在广义上的文人职业的流亡社会学。各方面的论证都显示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或经济上较为富裕的阶层在流亡社会中占有更大的比例:救援所需的前提条件就是大量的金钱和道义上的支持;需要金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必须与美国取得联系;船票价格以及在美国生活费用不菲;美国领事馆对流亡者精挑细拣,他们挑拣的标准包括政治因素在内,而很多人也因为经济或文化条件未能成行。要想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不仅需要钱、一定程度的声誉或者知名度、美国朋友或者同事的四处奔走,还需要大量的精力和一点点运气。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去了解这样

---

<sup>①</sup> 米歇尔·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 1952—),德国历史文化专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